

# 云冈石窟第 5、6窟相关问题探讨

□ 员小中

## 一、第5、6窟及其附窟

云冈石窟坐落在山西大同城西16公里的武州山南麓,是始凿于公元5世纪中叶的北魏皇家石窟。石窟被两条自然冲沟分东、中、西三部分,第5、6窟就在中部窟区的东边(图一)。窟前有清顺治八年(1651年)建的三层木阁楼窟檐。楼阁内是云冈中期开凿最大的中心柱窟和大像窟。楼阁顶是山体削出的长40米、宽5米的平台。台上崖壁高10米左右,壁面有11个窟,与东北向龙王庙冲沟上方16个窟共同属于5、6窟附窟的一部分,这27个附窟在同一高度,接近山顶,是云冈石窟最高的洞窟。清代云中八景之一的“石窟摩云”就指此处,明清间许多文人墨客曾在这里登高远眺,留下了众多感怀诗篇。

这里的外观让人心存疑问,5、6窟上方还有相当高度,为什么开窟时没往上开而留一平台?5、6窟为何会在台下?我们通过仔细察看,这片附窟的壁面转弯处有一截2米宽的似为当时开窟时留下的界墙一样的山体残留,据此可推断这两个朝向的窟区,非同一工程,即开凿时间不同,主人不同,功用不同。可猜测5、6窟上方平台是有意开出的,龙王沟区域附窟与此台没有关系。

## 二、第5窟与第19窟

第5窟与第19窟窟型一样,两窟号称云冈石窟第一和第二大窟。其实它们窟高、像高和进深几乎一致,坐姿也一致都是半跏趺坐,盘腿宽度也惊人的接近(见附表)。有别的是一个禅定手印,一个说法手印。这两个窟显然存在着某种联系,造像主出于某种考虑而约定了一个高度。所以这两窟保持高度一致,为保持这一高度,5窟在上部平台高度局限下,下部尽力向下开,以致窟内地面低于窟前地面和6窟地面,今天游人明显可看到。

就时间先后而言,19窟是早期造像,5窟是中期工程,所以是第5窟模仿第19窟的。从两者对比数据看,可以说5窟的主持者用的是19窟的图纸或营造19窟的工匠谱系。因为第5窟从规模、题材、风格俨然与第17、18、19、20窟是一致的,由于泥皮包裹,我们无法看到5窟的主像本来面貌,但其火焰纹与20窟一样。造像主为什么会在距西部大像窟很远的中部又建一个大像窟,出于何种目的?现在学界认为第5窟是孝文帝为其父献文帝而开,理由是孝文帝太和十五年(491年)四月,经始明堂,改营太庙的诏书中“二祧”之选:“诏曰:‘祖有功,宗有德,自非功德厚者,不得擅祖宗之名,居二祧之庙。仰惟先朝旧事,舛驳不同,难以取准。今将述遵先志,具详礼典,宜制祖宗之号,定将来之法。烈祖有创基之功,世祖有开拓之德,宜为祖宗,百世不迁。而远祖平文功未多于昭成,然庙号为太祖,道武建业之勋,高于平文,庙号为烈祖。比功校德,以为未允。朕今奉尊道武为太祖,与显祖为二祧,余者以次而迁。’”<sup>①</sup>“二祧”即功德特殊,可永居祖庙的人。孝文帝把北魏第二阶段的“二祧”定为道武帝和献文帝,可见献文帝在他心目中的

法手印。这两个窟显然存在着某种联系,造像主出于某种考虑而约定了一个高度。所以这两窟保持高度一致,为保持这一高度,5窟在上部平台高度局限下,下部尽力向下开,以致窟内地面低于窟前地面和6窟地面,今天游人明显可看到。

第5窟与第19窟对比表

单位:米(数字来源自《云冈石窟内容总录》)

项目 窟号	窟形	窟高	像高	宽度	进深	明窗	门拱	盘腿	胁侍
5窟	平面马蹄形穹隆顶	17.4	17.0	20.5	11.6	5.7*5.9	5.3*4.8	15.0	7.5 7.1
19窟	隆顶	17.2	16.8	19.0	10.9	6.2*5.6	5.8*3.8	15.3	7.9 8.0



图一 云冈石窟第5、6窟远眺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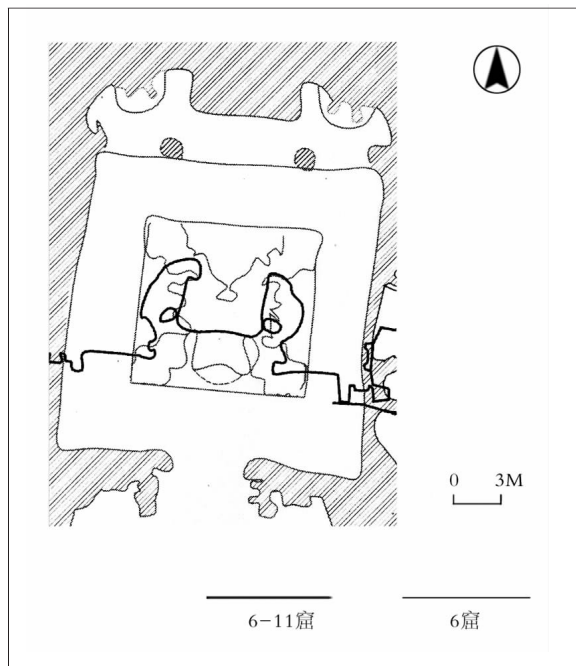
地位。第19窟位置靠后,窟外耳洞“八”字形。显然是昙曜五窟的中心窟,代表太祖的位置,所以孝文帝照其样式大小为显祖献文帝开了第5窟。问题是如果在诏书下达之后才开第5窟,显然迁都之前四年间不可能完工,迁都后更难以保证。所以第5窟开凿时间应往前推,提到太和四年(480年)“秋七月甲辰,幸方山。戊申,幸武州山石窟寺。庚戌,还宫”。<sup>[2]</sup>这是在献文帝去世四周年的时候,孝文帝来到武州山石窟寺,并且住了两晚。他完成了“三年之孝”,理应开始筹划开窟造像的事了。孝文帝为父亲策划开一个大像窟,但直到十五年冯太后死去半年之后才提及“二祧”之事,可以说用心良苦。

### 三、第5窟与第6窟

第5窟与6窟共顶一块平台。从外观看5、6窟前壁三塔柱与7、8窟前格式相似,好像是统一的设计理念,看来是一组双窟。并且从间距看来也很紧凑。但从内部看6窟的中心塔柱窟形与第5窟大像窟形格格不入。不像其他双窟那样形制、题材、风格一样。例如1、2窟,7、8窟,9、10窟外观和内部是一致的,这能否说明5、6窟是不同时期、不同目的的工程?我们从6窟“回”形平面图看,6窟西回廊宽度比东回廊宽度大50厘米,实地考察,东回廊壁面中部以下故意回收。可以想象,第6窟施工中在塔柱位置确定之后,先开西回廊,在打东回廊的时候发现间距不够,有误差,于是采取缩减回廊宽度,在间距最薄之处用千佛取代了大龕等措施挽救。即使这样5、6窟也险些被凿穿。今天人们从第6窟东壁漏出的小孔惊叹古人的雕凿技术,殊不知当时是何等的危险,是工匠们用他们的智慧化险为夷。我们从6窟东回廊底边窄于西回廊底边的事实可证此事,即使考虑西回廊下部分化因素,也不会有50厘米左右的分化深度。所以第6窟可能是插进来的,至少东壁下部开凿时间在第5窟之后。

### 四、第6窟与附窟6-11

第6窟是中心塔柱窟,高15.5米,上距6-11窟有4米到5米的厚度。是云冈石窟六个塔柱窟里最大的一个。其雕饰华丽的风格被誉为云冈第一伟窟,雕刻时间可延续到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后。第6窟建造者在平台上也做着开窟、建阁的文章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6窟的正上方山体有被削凹进的一块,面阔11米多,外壁有梁孔遗迹,靠近山顶两边



图二 6-11与6窟平面关系图

岩石对称缺角好似架过横梁。这个遗迹显示当时建筑要比清代留下的现存建筑大得多。建筑后面是一处平面马蹄形的石窟,开口5.4米,圆拱龕、穹隆顶,造像是一佛二菩萨,这就是6-11窟。由此形制想到鹿野苑石窟第6窟,焦山寺石窟第6窟,甚至远及炳灵寺119窟第6龕,他们都是这样一种窟形和造像组合,但规模要小得多。这种窟形是早期的窟形。再看造像,风化严重,从遗留的蛛丝马迹看,主佛发髻为纵向拉伸水波纹,与第6窟四壁坐佛和立佛发式相同。东边菩萨头戴风轮蕉叶花冠,配长璎珞,右手扪胸,左手持瓶,身材修长,姿态婀娜生动,长裙褶纹细密隆起,异于阶梯衣纹,类似敦煌275窟菩萨裙纹。这种着装与形态在第6窟不见,在12窟西壁有相近者。可反映出6-11造像来自不同派别的施工者。整体可看作是太和十三年以前的风格。这种稍晚的服饰、冠饰、发式出现在这种稍早窟形中,体现出一种造像变革潮流,当然归根是受社会变革的影响。再看6-11与第6窟的关系,2008年6月我们请山西省地矿局217地质队测了两者平面图,同比例平面图叠加可看出6-11不偏不倚正在6窟塔柱之上,而且坐佛的位置在塔柱的中心(图二)。这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工作,分析它们的关系也许能揭示出第6窟更深层次的秘密。

我们按三种情况设想6窟与6-11开凿时间关系:1.同时开凿 2.先开6-11 3.先开6窟。

第一种设想 两者同时开凿。

问题 :为何不联为一体 ,留一平台隔开上下不见 ?下边中心柱窟相当华丽 ,人物形象众多 ,上边穹顶窟只三尊像 ,而且风格不同 ,如果统一设计 ,要表达什么现实意义和宗教意义 ?

第二种设想 先开 6-11。工程小 ,可能性大 ,故意留平台。从高允《鹿苑赋》中“即灵崖以构宇 ,疏百寻而直上” ;“若祗洹之瞪对 ,孰道场之途迥” ;“凿仙窟以居禅 ,辟重阶以通述”几句描写云冈建设情景 ,可理解这一区域为佛道共有场地 ,“重阶”即高台(笔者《献文帝与云冈石窟》有专论)。

问题 6 窟开凿时为何要把 6-11 放在塔柱上部中心位置 ?是否是对献文帝的崇敬 ?还是另有宗教含义 ?

第三种设想 先开 6 窟。这与开窟的整体计划有关。西边昙曜五窟崖壁上在离地面 17 米左右的地方有一条整齐凹槽和椽眼 ,中部五华洞窟区(9 至 13 窟)也有这样的痕迹 ,高度相当 ,这是当时窟前建筑的顶端 ,开窟的上限、规划的高度。也是岩质好坏的分界线 ,此上的岩层不适宜开凿 ,所以昙曜量体裁衣计划了“高七十尺 ,次六十尺”造像高度 ,按当时 1 尺合 27.8 厘米计算 ,正是 17 米到 19 米左右。为保持高度一致 ,6 窟高度在此范围之内。后来开窟者为确定 6-11 在主窟塔柱中心 ,在 4 米到 5 米的厚度上方 ,把相对于塔柱之前的山体削去 ,形成平台。

问题 若 5、6 窟工程在孝文帝迁都之前没完工 ,迁都后仍继续 ,是否还能顾及平台上那么大的工程 ?平台何时开出 ?

从以上三种设想中 ,我们看出第二种比较有可能 ,6 窟稍晚于 5 窟竣工(下文论述) ,在 5 窟开凿之前 ,上方已有平台。6 窟主体设计因地制宜利用平台开 6-11 窟。5 窟则与平台没有必要的关联 ,上方附窟是晚期作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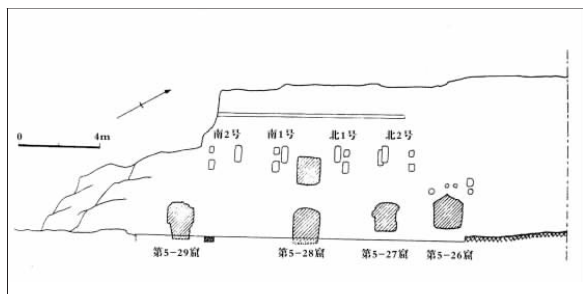
### 五、附窟 5-28 与昙曜译经

龙王沟区域 16 个窟中 5-28 窟最大 ,此窟是中心柱窟 ,有明窗门拱 ,塔为方形两层 ,形式类似于第 1 窟 ,是云冈完工的六个塔柱窟里最小的一个(前五个 6、11、2、1、39 窟)。窟外明窗上方有梁孔遗迹。梁孔分两种 :大梁孔 ,四个 ,双梁孔(上口小 ,下口大)四个 ,均以 5-28 窟为中轴线。据 1987 年龙王庙考古发掘报告 ,5-28 窟前有过两次建筑 ,双梁孔建筑时间较晚 ,是辽代的 ,由梁孔测得该建筑面阔三间 ,有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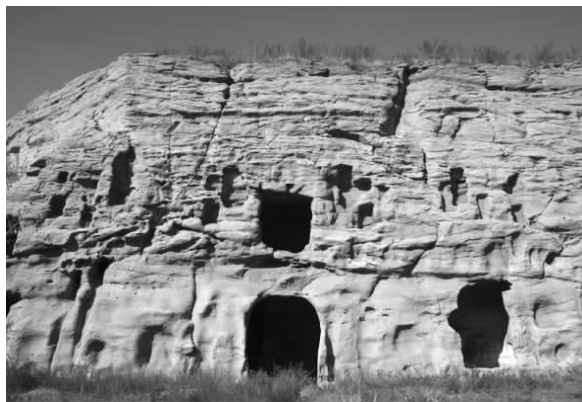
右耳室(图三、图四、图五)。并根据探沟文化层推测 ,此建筑起台基时清理掉了大梁孔建筑的残迹 ,并且此建筑分礼拜区和生活区两部分<sup>[3]</sup> ,看来这一区域曾经是能作佛事活动的佛寺场地。我们要关注的问题是 5-28 是何时的 ?辽以前这里是干什么的。报告里没有答案 ,我们有必要放开思绪往前追溯。

辽以前自北魏后 ,平城版图依次划为东魏、北齐、隋、唐。云冈窟前建寺大概只有北魏和隋唐 ,北魏 453 年到 494 年迁洛前基本是皇家工程 ,开窟建寺都在前面山崖 ,大一点的都是成双成组的 ,不会单独出现。迁都后云冈为“燕臣”之地 ,西部小窟遍布集中连片 ,构成贵族区但没有窟前建筑。5-28 既有中心柱窟 ,又有礼拜大堂 ,位置又特殊 ,定有其特殊成因。

我们看看窟内 :四壁坐佛上小下大 ,透视效果明显 ,布局相当规整 ,四壁佛像满目 ,造像风格朴素 ,整个壁面给人肃穆感、充斥感和回想感。从造像看 ,此窟开凿时间基本为云冈中期 ,与 11、12、13 窟时间相当。具体可框定在太和七年至太和二十年。很明显这是禅僧观想的礼拜窟 ,是一个成功完成的洞窟 ,开窟完成后窟前建寺。从规模和窟前建筑看寺主是有一定地位的重要人物或高僧大德 ,长期居此进行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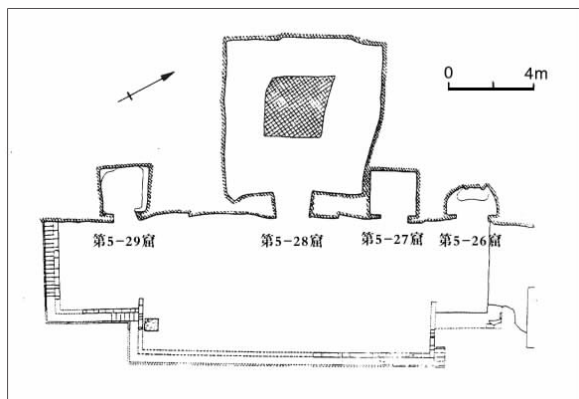


图三 5-28 立面图



图四 5-28 窟外景





图五 5-28 平面

教活动。细数太和年间与云冈有关的众僧,恐怕昙曜最有资格住在这里了。

昙曜可谓四朝元老,历经太武、文成、献文和孝文四代皇帝。在三十年的沙门统生活中,昙曜边主持开窟,边组织译经,边管理寺庙。他大半生的生活起居应不离武州山,这里应有他的栖身之地。

当时武州山是与长安、洛阳并称的三大译经中心之一。译经场所要安静,远离工地,龙王沟这一带正符合这一条件。5-28窟这里交通便利,从山上西行可察看西部窟区工程,向南50米走可达5、6窟平台,瞭望中区、东区工程情况,还可在台上晒经。每日早晚窟前五六十平米的建筑空间可容纳一定数量人做佛事。不能排除此地为昙曜等人译经之地。当然人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昙曜译经地方是第3窟窟前和山顶建筑,但那里缺乏做佛事和观禅的场所,其遗存结构显示是金代建的大阁九间。而北魏12个梁孔对应柱基不见,建筑样式不明,不能确定用途。

唐人多称昙曜为恒安石窟通乐寺沙门。道宣的《续高僧传》中说:“元魏和平年,昙曜‘住恒安石窟通乐寺,即魏帝之所造也,……建立佛寺,名曰灵岩。龕之大者,举高二十余丈,可受三千许人。’”“通乐寺”之称显然是唐朝代指整个武州山石窟。《续高僧传》中说大龕高二十丈有些夸张,现最高第3窟不到十丈。唐人所谓通乐寺在哪里?云冈石窟窟前考古发掘中,只在第3窟前室西侧发现有唐代文化层,有寺院建筑痕迹,而且报告中肯定说这时始成寺院<sup>[4]</sup>。这可能就是《金碑》中“唐贞观十五年,守臣重建”的地方。3窟前区域即是唐人所称恒安石窟通乐寺。《金碑》在说完十寺排序后又说:“复有上方一位石室数间,按《高僧传》云:‘孝文时天竺僧翻经之地也。’”显然这“上方石室”就是本文所指的龙王沟和5、6窟之上的那27个附窟。《金碑》书于皇统七年(1145年),距今864年,当时曹衍可看到遗迹比现在的多。对5-28窟的认识与本文相同,说明这里不在十寺之内。天竺僧有常那邪舍、吉迦夜等人,都是昙曜的合作者,他们译经应该在一处。据此5-28应该为译经场所,且与唐人所称通乐寺相近咫尺,可视为一处。说昙曜住此不为过。

[1]《魏书》卷108《礼志一》太和十五年四月诏。

[2]《魏书》卷7《高祖纪上》。

[3]赵曙光《龙王庙沟西侧古代遗址清理简报》,《云冈百年论文集卷一》1987年。

[4]云冈石窟文管所《云冈石窟第3窟遗址清理简报》,《云冈百年论文集卷二》。

(作者工作单位:云冈石窟研究院)